

现代思想译丛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Ten Great Economists

[美] J·A·熊彼特 著

韩宏 蒋建华 何跃中 吴雪云 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编 吴 源

策划 余江涛

现代思想译丛

Ten Great Economists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美] J·A·熊彼特 著

韩宏 蒋建华 何跃中 吴雪云 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美)熊彼特著;韩宏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2000重印)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ISBN 7-214-02460-8

I. 从... II. ①熊... ②韩... III. 经济学家-评传-世界
IV. 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3419 号

- | | |
|-------|---|
| 书 名 |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
| 著 者 | [美]J. A. 熊彼特 |
| 译 者 | 韩宏 蒋建华 何跃中 吴雪云等 |
| 责任编辑 | 刘 焱 蒋卫国 |
| 责任监制 | 蒋子平 |
| 出版发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 网 址 | http://www.book-wind.com |
| 集团地址 |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印 刷 者 | 连云港市海狮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9 插页 2 |
| 字 数 | 200 千字 |
| 版 次 | 2003 年 11 月第 2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7-214-02460-8/F·572 |
| 定 价 | 17.00 元 |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是在 1910—1950 年这 40 年间写的,最早的三篇(瓦尔拉、庞巴维克、门格尔)是用德文写的,其余各篇是用英文写的。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外,它们都是为一些杂志写的文章,有的是为某位经济学家的去世而写,也有的是为了某些事件的周年纪念而作,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 50 周年、帕累托诞辰 100 周年等。因为这些文章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匆忙写成的,熊彼特认为将它们出版成书的价值不大,但有时需要用到它们,而刊载它们的杂志又不易找到,所以在 1950 年 1 月,即熊彼特去世前几个月,他最终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它们出版。

这十篇主要的文章,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篇以外,都是由熊彼特本人亲自挑选的。他本计划收录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00 周年而为《政治经济学杂志》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与经济学》(1949 年 6 月)这篇文章,后来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取代了它,因为它更

全面地论述了作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我十分感激卡斯·坎菲尔德先生和哈培尔兄弟出版社，他们慷慨地准许将这篇文章收入本书。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经济学季刊》、《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杂志》等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们，是他们同意将原先由他们的杂志刊登的文章收入本书。还有些文章刊登于以前的《国民经济》杂志，该杂志现已停刊。

附录中关于克纳普、维塞尔和博特基威茨的三篇短文是根据哥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的建议收入的，他认为应该重新出版它们，并和其他传记体的文章一起选入本书。这些文章分别是熊彼特作为驻奥地利通讯员（1920—1926年）和驻德国通讯员（1927—1932年）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在这期间熊彼特离开德国的波恩大学，转到了美国哈佛大学。

作者和这些传记文章的主人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他钦佩他们的工作，而且是因为他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很熟悉，和其中几位还有着深厚的友谊。但马克思是一个例外，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而熊彼特和凯恩斯一样，恰好在这一年出生，凯恩斯是十位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熊彼特和马克思有着一共同之处——对经济过程有着相同的看法。在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中，熊彼特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在推动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的”。在这本书的日文版的序言中他写道：“开始时我不清楚，但对读者来说很快就会看清，是什么思想、什么目标（熊彼特本人的）和构成马克思的学说的这些思想与目标完全一致。事实上他和他同时代的以及他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正在于对经济过程的看法，即这种过程是否由这个经济制度

本身所引起。在其他的所有方面他只是引用李嘉图的概念和观点,但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将其置于次要的黑格尔的背景中,却完全是他自己的意思。这可能是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总是重新提起他的原因,虽然他们能找到许多可以对这一概念进行批评的地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思想总的纲要中,发展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静学的附属物,而是该时期经济的中心问题。他把他的分析重点集中在揭示经济过程是怎样由自身的逻辑决定的,揭示不断变化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的辩护人。

对熊彼特来说,经济学是一门要借助于眼光和技术的学科。他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眼光,同时也推崇他只见过一面的瓦尔拉的纯经济理论。关于这点,他在《经济分析史》里说:“经济学是一辆大公共汽车,它载着许多兴趣和能力不相称的乘客。但**就纯经济理论来说**,我认为瓦尔拉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结合在一起,这是惟一能和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类比的经济学家的作品。”

马克思和瓦尔拉截然不同,一个试图给出经济变化的逻辑解释,另一个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它在我们的科学史上第一次有效地使用了经济数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熊彼特的特点是:对历史的和纯理论的东西、计量经济学和收集到的大量实际资料、社会学以及统计学,他持赞赏态度,认为它们有用。如此广泛的兴趣也反映在这些传记性的作品中。

他在维也纳学习期间就认识了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

门格尔和他的两位弟子——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可以算是奥地利学派的共同的创始人。那时门格尔已从大学退休。熊彼特只和他见过一两次。但是这些传记的作者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的积极参加者(1904—1906年)。后来,他和庞巴维克就利息率的问题展开了著名的论战;1921年庆祝维塞尔70诞辰时,他是三位发言者之一。

虽然他很看重奥地利学派,在这个学派中受到了训练,但他对提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学派——洛桑学派更感兴趣,这个学派源于瓦尔拉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帕累托。帕累托是瓦尔拉的学生,后来接替瓦尔拉在洛桑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直到现在,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著作是太“数学化”、太“理论化”了,同时英美经济学家发觉,阅读用其他文字写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困难的(也许是浪费时间)。但是洛桑学派在早年就有了两位第一流的美国信徒——欧文·费雪和H.L. 穆尔。本书中的十篇文章有三篇是献给瓦尔拉、帕累托和费雪的。在关于帕累托的文章中,熊彼特描述了一次集会,会上谈论了许多经济学家,帕累托对欧文·费雪大加赞扬。熊彼特说:“在我听到他(帕累托)高度评价(费雪的)《资本和收入的本质》时,颇感意外。”

1906年,熊彼特在维也纳获得学位以后,又到英国待了几个月。在那儿他拜访了几位经济学家,并在1907年首次遇见了马歇尔。熊彼特在1933年12月写给《经济学杂志》的有关凯恩斯的《传记文集》(*Essays in Biography*, 中译本为《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评的注释中描述了这次会见。在评论凯恩斯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时,他写道:“当我在1907年的一个早餐时间

隔着桌子看他时，我告诉他（马歇尔）说：‘教授，在我们谈话之后（关于我的科学计划），我的确感到我就像一个不慎重的恋爱者正在尝试一场冒险的婚姻，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伯试着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回答道：‘这本来就是如此，如果在这方面能有什么作为的话，老伯的劝告就没有用了。’”熊彼特在本书中表明了他对马歇尔著作的态度，这篇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之后，他收到玛丽·马歇尔 1941 年 6 月寄自英国剑桥的一封短信。信里说：“刚收到《美国经济评论》，我正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你写的纪念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 50 周年的文章。我知道你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我很高兴你能借此机会如此热烈地、恰当地表达这种评价。这篇论文的最后一段尤其使我感到欣喜。我也和你一样欣赏凯恩斯的《纪念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

在评价美国经济学家（陶雪格、费雪、米切尔）时，熊彼特可能是第一次遇见他们。那是在 1913—1914 这一学年，熊彼特可能是作为交流学者来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在此之前，他阅读过他们的著作，而且至少和陶雪格通过信。陶雪格于 1912 年 11 月 27 日从剑桥写给他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赞扬这位青年经济学家的英文水平，然后讨论了后者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我对于你的论证没有争议，但我的倾向是以更现实的观点来探讨这些问题。”陶雪格在提供了一些供给图表以后说道，“我想把和资本、土地一样的论证运用于劳动力，并发展一种‘租赁’劳动理论。我已经草拟出一个大纲。你当然知道，我的朋友 J. B. 克拉克进行过这种论证，而后来欧文·费雪也进行了更仔细的论证。这个论证还没有最后的结论。我并非如此不谦虚，以致自认为可以由我来得出这个结论，但我希望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这样的友谊一

直持续到1940年陶雪格逝世为止。实际上,在熊彼特到哈佛的头几年(1932—1937年),他和陶雪格一直住在斯考特街2号。

同样,他钦佩欧文·费雪和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他们也有一定的感情。他和费雪共同创办了计量经济学会。当熊彼特到费雪在纽黑文的俭朴的家中访问时(那儿没有烟、酒、咖啡,甚至连肉都见不到),咖啡是为这位“堕落的”客人准备的。阿尔及尔大学的G. H. 布斯凯教授在1950年第3期《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描述了这次发生在周末的交谈。本书中纪念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逝世的文章是熊彼特在逝世前一两个星期完成的。米切尔和熊彼特都研究商业循环,他们都相信,为了成功地研究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需要最广泛的实证研究。熊彼特辛勤地收集资料,几乎没有别人的帮助,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但是他对那些能够明智、有效地利用国家经济部门的有关资料的人十分赞赏。

虽然凯恩斯曾经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从1920年起就是这个杂志在奥地利的通讯员,但直到1927年熊彼特和凯恩斯才见了面。由于一些不易解释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专业角度来说,都不十分密切。

对评述瓦尔拉、门格尔、庞巴维克的那三篇文章的翻译曾出现过困难。正如保罗·斯威齐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序言以及哈伯勒早些时候在《经济学季刊》中提出的那样,熊彼特的德文风格特别难翻译。哈伯勒说:“他的有些书卷气的笔调,也许最可以被形容为‘奇异的风格’,这种风格恰好能表现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构。这种风格的特征表现在长句子、大量的修饰短语、对修饰语的再修饰、对涵义差别的辩解。他的这些风格特征,正如人们所想

到的,在他的德文著作里特别显著,因为德语更适合于复杂的结构。”熊彼特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他认为那篇文章太长,应加以删改,并为英语读者而重写。他着重指出,不那样做是不行的。

本书中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比原作删去了一半。这项工作是由哈伯勒和文章的译者赫伯特·查森豪斯教授一起进行的,而赫伯特·查森豪斯是作者的学生。在这儿我要表达我对哈伯勒教授以及三位译者的感谢,感谢他们慷慨的关心和帮助。我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和我一起阅读了全文,帮我润色英文以及在多处澄清涵义。出于某些考虑,我不得不对有些章节中的直译和模糊不清之处作了修改,特别是那篇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因此它的责任在我,完全由我一人负责。

其他的论文都是用英文写的,这次按原样发表。除了一些小的印刷错误,以及为了保持格式的一致而作的一些小的改动——比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注释的排列等之外,没有作其他改动或修订。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

1951年2月2日

目 录

1 前言

- 1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 59 马利·埃斯普里·里昂·瓦尔拉(1834—1910)
- 65 卡尔·门格尔(1840—1921)
- 75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
- 93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
- 127 欧根·冯·庞巴维克(1851—1914)
- 177 弗兰克·威廉·陶雪格(1859—1940)
- 204 欧文·费雪(1867—1947)
- 217 韦斯科·克莱尔·米切尔(1874—1948)
- 23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 265 附录
- 267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克·克纳普(1842—1926)
- 270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1851—1926)
- 274 拉迪斯劳斯·冯·博特基威茨(1868—1931)
- 277 译者后记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它们不是作为未被认识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出现的，而是以作者个人的方式、带着个人的印记出现的，这些是人们能看到、感受到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按这个意思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将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免受我们的喜好憎恶的影响。我们不必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定是在它的基本的构思和细节方面完全正确、一点错误也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应是黑暗中的一股力量，我

* 选自 J. A.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1942 年版。哈培尔兄弟出版社允许转载。

们可以想象它基本上是错的,或者不同意其中任何一个特别的观点。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

过去的 20 年里,世界目睹了马克思学说的有趣的复兴。这位社会主义信仰的伟大导师在苏联受到敬仰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只是在马克思理论的真实涵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思想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正像低微的宗教的教义和中世纪的领主的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一样。

但另一个现象却不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因为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美国,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放在重要的位置。在那儿,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直是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不重要的,因而是没有地位的。而且,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在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中并没有产生同样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它在所有的国家中有着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个规模不大的正统学派在战前社会主义思潮高涨时期保持了活力,正像先前经济萧条时期那样。但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领导人(不光是那些和社会民主党有关系的领导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实践上过于谨慎保守的领导人)在继承旧的信条方面有些误入歧途。同时,他们对马克思的这些教义有着对神一样的态度,与它保持一段距离,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看待经济问题。美国的现象也很独特。我们不关心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概括一下许多美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关于马克思的预言的轮

廓和内容,以及它们的涵义,还是值得的。^①

一、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

本节的题目用了一个宗教界的比喻,这并非是由一个小的失误造成的。这不仅是一个比喻。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信仰。对信仰它的人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意义,一种判断事件、行为的最终标准。其次,它提供了一个把人类或人类的一部分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指南。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也属于那种在坟墓前指引通向天堂之路的学说。我相信用文字来阐述这些特性将提供一个分析、评价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机会,更能从社会学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作更深入的分析,这比由经济学家来完成来得更深入。

说马克思属于一种宗教信仰还有次要的一点: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就。从纯粹的科学成就的角度讲,马克思做得很完美,但这不可能赢得不朽的历史意义。他那个党派口号的弹药库也不能做到这些。他的一些成功,虽然是很小的一部分,确实归功于他在他的同伴们面前演讲时随时可用的热烈的词语、激烈的谴责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点要说的是,这个弹药库已经被运用了,并按预期目的被很好地运用着。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病。为了铸造这

① 我们尽量不多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提供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因为这似乎是不必要的。想得到马克思著作的目录和其生平资料的读者,可以在其他有关的字典里找到,特别是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或《社会学百科全书》中。研究马克思,从《资本论》第一卷开始最为方便,在众多的传记作品中,我认为 F. 梅林的最好,至少对一般读者而言是这样的。

样的为社会斗争所需的武器，马克思不得不常偏离按他的体系的逻辑发展的观点。然而，如果马克思仅仅是华丽词藻供应商的话，他的学说今天早已消亡。人们不会感谢那种形式的服务，会很快忘掉那些为他们的政治歌剧谱写歌词的人的名字。

但是他是一个预言家，为了理解他的成就的本质，我们应该用他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理论。那个时代是资产阶级物质成就的顶点，又是资产阶级文明极度衰落的时代，一个没有表现出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孕育的迹象的社会，表现出令人憎恶的陈腐的景象。社会所有阶层的真实信仰很快地被抛弃，工人中仅有的一线光明也已消失，而知识界宣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体系》和贫困的法则感到满意。

现在，在亿万人的心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地球上人类的天堂”的预言意味着一线光明和生命的新的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是一种不真实的信仰或是一种对信仰的歪曲的模仿——这儿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不要忽视或不承认他这一成就的伟大。成千上万的人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马克思的预言的真正意义。这一点并不重要。这是所有预言的命运。重要的是这一预言是以一种在当代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表达出来的，而实证主义无疑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从资产阶级思想中产生的”并不矛盾。这是在以下情况下完成的：一方面，像许多不成功的人感到的那样，他们受到阻挠和不公正的待遇，因而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将把人类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推理。

看一下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的高明的艺术是如何成功地将那

些非理性的期望——它们没有了信仰，像一群丧家之犬似的在乱闯——和现在的不可避免的唯理主义倾向结合在一起的，后者不能容忍没有科学或伪科学的涵义。宣传自己的目标不会有效果，对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的分析只会使几百个专家感兴趣。但是用分析的形式宣讲，而分析又针对人们内心的需要，这样就能避免被情绪支配。抱着这样的信念，一个人为之而奋斗的东西不能被打倒而终将会取得胜利。这给了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胜利。这个当然不是成就的全部。个人的力量、预言的光辉对信念的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些，新的生活、生命的新的意义都无法被揭示出来。但我们在这儿先不涉及这些。

关于马克思要证明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这个论点的说服力和正确性，我们还要说一下。只此一点就足以对他上面关于不成功的人的感情的阐述作出说明了。这当然不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对实际感觉的真实阐述。我们宁愿把它称作试图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或错误的揭示来代替实际的感觉。马克思这样做，是不实际地把他自己的“阶级觉悟”的术语（很不实际地）用于群众，他无疑是曲解了群众（这集中在工人的愿望是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以及利用政治力量取得这一身份上），但他仍然写出并强调这一术语。他没有为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流出充满感情的眼泪，这是他自称优越于被他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人的地方之一。他也没有把工人夸耀为每日刻苦工作的英雄，像资产阶级在为自己的利润而焦虑时所做的那样。他完全不受任何倾向的摆布，不像某些追随者那样刻意奉承工人。他很了解什么是群众，他所期望达到的社会目标不是工人所能完全理解的，而且他从没有教过别人由他自己树立的什么理想。他和这些空洞的东西从不相

关。像每一个真正的预言家称自己为上帝的代言人那样，马克思自称，自己只不过是在阐明社会发展史的逻辑罢了。这里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弥补了许多琐碎和粗俗的东西，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这两类事物非常奇妙地结合了起来。

最后，有一点不能不提，马克思本人十分有教养，以至于不能和那些粗俗的社会主义的教授们相提并论。他们看见了圣堂，但不承认它。他完全能够懂得他的“相对的绝对”价值，不管离开它多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能够比《共产党宣言》更能为他的宽宏大量提供证明的了。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一列举，即使在宣判资本主义在将来的死刑时亦是如此，他从未忽视它的历史作用。这样的看法包含着许多马克思本人也不愿接受的东西，但他对此无疑是坚定不移的。他对历史逻辑的洞察力使他能够更容易地给他的历史理论一个独特的表述。社会问题对他来说变得有规律可循，在他一生中的许多时候，他有可能成为谋士，但他鄙视那些事。他并非完全迷恋于社会主义以至于使其他生活色彩完全消失，制造出一个对其他文明的不健康的愚昧的仇恨和轻蔑的观念。从更多的意义上说，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的基本立场以及社会主义意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二、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

现在我们不得不做一件会遭到忠实于马克思的信徒反对的事了。他们自然要反对贸然分析那些对他们而言是真理的源泉的理论。但是他们最反对的事就是“肢解”马克思的著作，然后一篇一